森林进城市 生活更幸福

——国家森林城市建设综述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黄俊毅

鄂尔多斯南有毛乌素沙地、北有库布其沙漠，是我国华北地区的重要风沙源，自古风大沙多。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鄂尔多斯森林覆盖率提高到25.81%，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32.99平方米，生态环境实现了由严重恶化到大为改善的巨大转变，2015年获得“国家森林城市”称号。

鄂尔多斯由风沙源变身森林城市，是我国森林城市建设成就的缩影。2004年，贵州省贵阳市被授予“国家森林城市”称号，成为全国首个获此殊荣的城市。15年来，我国先后举办了9届中国城市森林论坛和5次森林城市建设座谈会，总结推广经验。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38个城市获得“国家森林城市”称号。

党的十八大以来，森林城市建设在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改善中的作用越来越凸显。原国家林业局确定了国家森林城市建设40项指标，森林城市建设已成为增加森林面积、保护森林资源的有效手段。

“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城乡绿道、郊野公园等城乡生态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森林城市，建设森林小镇。《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建设森林城市，进一步提高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和城市建成区绿地率，让城市更自然、更生态、更有特色。国务院将国家森林城市称号批准列为政府内部审批事项，将森林城市工程列入“十三五”165项重大工程项目中。

鄂尔多斯治沙领军人物、亿利集团董事长王文彪记得，小时候大风经常扬起流沙，形成上百米高的沙墙，铺天盖地而来。但如今，库布其沙漠森林覆盖率、植被覆盖度已分别由2002年的0.8%、16.2%，大幅提升到2016年的15.7%、53%。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统计数据显示，过去5年间，全国开展森林城市建设的城市造林总投资超过4500亿元，其中一半以上来自于社会。对138个“国家森林城市”的监测数据显示，近5年每个城市年均新增造林面积20万亩以上，大大高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有力地推进了森林资源增长和国土绿化进程。

近年来，云南昆明市通过建设森林城市，城市生态环境显著改善。图为红嘴鸥在洱海与市民嬉戏。 本报记者 黄俊毅摄

各地通过实施森林增长工程，开展城区的拆迁补绿、见缝插绿，建设郊区森林公园、郊野公园，绿化水系和道路，显著增加了城市森林绿地面积。5年来，森林城市建设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拓展。森林进社区进乡村、进机关进学校、进园区进厂矿，城乡人居环境整体显著改善。各地通过发展以树木为主体的街头游园、休闲绿地，实现出门500米能见绿、能进林的目标，建设绿道和生态标识系统，无偿开放公园绿地，促进了森林惠民。

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每年专项调查，市民对建设森林城市的认知度和满意度都在90%以上，森林城市建设已成为实实在在的民生工程。

前不久，2014年跻身“国家森林城市”的广东省惠州市宣布，未来3年将建成26个森林小镇。目前，珠三角地区广州、惠州、东莞、珠海、肇庆、佛山、江门已先后获得“国家森林城市”称号，深圳、中山今年有望入列，一个“超级森林城市群”已经成形。

《林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到2020年，我国将建成200个国家森林城市、6个国家级森林城市群。具体地讲，就是“三带、六群”的发展格局：“三带”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森林城市防护带、“长江经济带”森林城市支撑带、“沿海经济带”森林城市承载带。“三带”作为我国重要的经济、城镇、城市发展带，将提高生态支撑能力，主要目标是为国家发展战略提供生态支撑，通过城乡统筹发展提升城乡森林生态系统功能；“六群”则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长株潭、中原、关中—天水等6个国家级森林城市群。“六群”作为各区域森林城市群建设的示范，将提高城市的生态承载能力，主要目标是推动森林连城，加强城市间的生态空间一体化。

据介绍，森林城市建设将以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增加城市森林面积、提升城市森林质量、增加城市居民游憩空间为目标，加强城市森林建设，使森林覆盖率达到《国家森林城市评价指标》要求，城区树冠覆盖率达25%。森林城市群建设将针对城市群发展对林业生态、产业、文化等多种服务功能的需求，以及有效应对区域性生态环境问题的社会期待，依托河流、湖泊、山峦等自然地理格局，构建互联互通的森林生态网络体系，使城市群地区蓝绿空间占比达50%以上。

煽起『网络恐中』别有用心

新华社评论员

最近，美国领导人发表演讲，对中国进行无端指责，妄称“中国会对美国发动网络攻击”。美国明明是制定网络攻击战略的国家，明明是公认的黑客大本营，却频频将自己描绘成受网络攻击的受害者。究其原因，就是企图通过妖魔化中国转移舆论视线，缓解自身压力，谋求一己之私。

互联网从美国起源，全球互联网核心基础设施大多在美国，各种核心技术的主要供应商是美国企业，美国还有最大的网络情报机构、全球首支大规模成建制的网军。作为互联网强国的美国，不但肆意侵犯别国权益，还一再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如此推卸责任、混淆是非，令人愕然。

多年来，美国在网络问题上劣迹斑斑，却对别国横加指责，甚至捏造所谓中国黑客，为自己的网络扩军造势。5年前，斯诺登引爆“棱镜门”事件，让世人“大开眼界”。美国窃听巴西、法国、德国政要，酿成多起外交风波。去年一度肆虐全球的“想哭”勒索病毒，也正是源于美国情报机构网络武器库泄漏的黑客工具。究竟是谁在操纵网络霸权，谁在放任网络攻击？事实胜于雄辩，公道自在人心。

去年，美国政府将美军网络司令部升级为美军第十个联合作战司令部，地位与中央司令部等主要作战司令部平等。网络司令部下属133支网络部队，已于今年5月全部具备全面作战能力。美国领导人在这次演讲中就宣称：“（政府已）授权加强网络领域的实力，建立针对我们对手的威慑力。”

此次美国领导人再次诬称中国开展网络攻击，与以往一样，背后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其不外乎：

用意一，转移公众对美国网络攻击和监听等问题的视线，以图达到自身解压、对中国施压的目的。

近几年美国网络攻击监视全球的丑闻一个接着一个：2016年，黑客组织“影子中间人”爆料，其攻入美国国家安全局网络“武器库”，里面部分软件属于秘密攻击全球计算机的强悍黑客工具，美国网络攻击目标中包括中国公司；2017年，“维基揭秘”网站发布机密文件，显示美国中情局拥有强大黑客攻击能力，秘密侵入了手机、电脑乃至智能电视等众多智能设备。

丑闻不断，如何“解套”？宣扬“外国网络威胁论”便成为一大套路。它一石二鸟，还能为美国网络扩军提供借口。于是，情报机构和军方可以获得新的授权或预算，相关承包商可以获得各类订单——这犹如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用意二，对中国网络技术、设备和企业“污名化”，胁迫其他国家在网络问题上排华，阻止中方企业参与相关国家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仅在美国，华为手机、大疆无人机、中国产监控设备等产品屡屡被贴上“安全隐患”的莫须有罪名。“泼脏水”、“贴标签”，中伤中国企业，美国正好凭借自身网络技术强势地位获取利益。

煽动“网络恐中”在美国颇有市场，但事实是，它不断“穿帮”。美国《彭博商业周刊》的“恶意芯片”报道就是最新的典型案例。这份杂志日前声称，历时一年多的深入调查发现，中国在苹果、亚马逊等约30家科技公司的产品中植入微型恶意芯片。然而，从报道中被点名的专家，到苹果、亚马逊公司，甚至连美国国土安全部都予以否认。虚假报道糊弄不了人！

网络空间高度复杂，存在各种新的挑战，正需各方密切合作、共同治理。中方已经多次表明了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的立场。中国也是黑客攻击的受害国。中国政府不会以任何形式参与、鼓励或支持任何人从事窃取商业秘密行为，并愿与国际社会加强对话合作，共同打击黑客攻击等网络犯罪行为。

一直以来，中国对中美网络安全合作表现出了足够的诚意，在合作打击网络犯罪、加强案件协查、信息共享等方面采取了切实行动。美方应拿出积极姿态，与中方相向而行。须知，谎言重复无益，合作方为正道。

（新华社北京10月14日电）

（上接第一版）

2001年，青岛市确立了挺进西海岸的战略，青岛港的重心也开始向西海岸的前湾港迁移。2011年，连接青岛东西两岸的胶州湾隧道通车，将两岸通行时间从1个多小时缩短为不到10分钟，大大提升了青岛的区域一体化水平。

2014年，经国务院批复同意，青岛西海岸新区成立。此后，青岛西海岸的发展步入了快车道，成立4年来，已累计引进产业项目1300多个，总投资超过1.2万亿元，其中百亿级的大项目达到33个。目前，青岛市10条千亿级产业链中，青岛西海岸新区拥有8条。

青岛的海洋经济发展更是迅猛。西海岸拥有海域面积5000平方公里，海岸线282公里。新区获批4年来，海洋资源优势得到极大释放，海洋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9%，总量从590亿元增长到1019亿元。

“我们目前正在全力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打造动能转换引领区。”青岛西海岸新区项目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夏秀彦介绍说，新区已重点规划建设信息技术基地、循环经济基地、智能制造基地、海洋制造基地等四大基地，中央活力区经济中心、实体经济总部中心、智慧医疗中心、绿色金融中心、体育产业运动中心、市民文化中心、生态休闲中心等七大中心，相继出台了推进总部经济、民营经济、绿色金融发展等方面的意见，助推西海岸新区发展全面开花。

如今，西海岸新区的经济总量已经占到青岛市的约三分之一，城区建设也日新月异。如今，漫步西海岸新区，所到之处绿意浓浓，繁花似锦，蓝色海岸线碧水悠悠。

自寻差距向未来 建设国际化大都市

虽然青岛的发展日新月异，但青岛人没有满足。

在很多人看来，今天青岛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不再是发展空间的局限，而是发展动能如何升级。青岛市仍然以家电、石化、服装、食品、机械装备等传统产业为主，制造业中传统制造业产值占比超过70%，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仅占GDP的10%。

2018年6月，上合组织青岛峰会的成功举办，给了青岛再次实现发展跃升的良机。借助举办峰会的契机，青岛市容市貌焕然一新。而上合峰会带来的更深层次影响，则是让青岛找到了清晰的发展方向和努力目标。

山东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张江汀指出，上合峰会的成功举办，标志着青岛正式迈入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行列。青岛要以全球视野谋划城市未来发展，奋力建设好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青岛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展规划处处长赵连玖介绍说，朝着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目标，青岛市提出了“七大行动”：服务谋划“大格局”，助力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服务建设“大平台”，助力增创高质量发展新优势；服务产业“大转型”，助力新旧动能转换核心区建设；服务开放“大通道”，助力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服务全域“大统筹”，助力构建区域、城乡、陆海协调发展新格局；服务生态“大花园”，助力保护青岛的“绿水青山”；服务环境“大优化”，助力营造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营商环境。

一大批发展新优势正在显现，青岛国际院士港就是代表之一。定位于突出“高精尖缺”导向，青岛市李沧区打造的这个具有首创性的院士创造创新创业创投高地，仅两年时间，已经签约引进108名院士，目前已有18个项目落地运营，9个项目产出30种产品，实现产值近50亿元。

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积极财政政策

（上接第一版）

以降成本和供给侧为主要目标和着力点，减税降费的实质，便系结构性改革而非总量性调节。其主要的推动力量，便系改革性行动而非政策性安排。因而，减税降费须同税费制度的改革结合起来，循着税费制度改革的方向展开而非另辟新径，重起炉灶。

这启示我们，应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固然要进一步加快减税降费步伐，但不可偏离降成本、供给侧和靠改革这一高质量发展阶段实施减税降费的基本行动路线。不仅扩需求须同降成本巧妙对接，在降成本的基础上进行，不能顾此失彼，造成重心偏离。而且针对需求侧的操作，须同削减政府支出相挂钩，不能以加大企业未来的负担为代价而寻求需求总量的短期提升。同时须注意将操作的基点放在税费制度改革上，既不能满足于政策调整，搞无明确指向的总量性减税降费，也不能以政策调整代替税费制度改革。

大不同于以往的扩大支出

在积极财政政策旗帜下的扩大政府支出操作，主要表现为扩大政府投资。与高速增长阶段大不相同，当下中国实施的扩大政府投资操作，是同调结构、补短板结合在一起的。

与调结构相结合，扩投资的着眼点，便不仅是扩大社会总需求，而且包括调整经济结构。鉴于主要矛盾是结构问题而非总量问题，扩大政府投资的操作，不仅要兼容扩需求和调结构两大目标，而且须将主攻方向锁定于调整经济结构而非扩大社会总需求，发挥政府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

与补短板相结合，扩大政府投资的着力点，便不仅是需求侧，而且包括供给侧。鉴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而非需求侧，扩大政府投资的操作，不仅要根据需求侧和供给侧的不同特点而区别对待，而且须以精准补短板为重点，释放有效需求潜力，优化中长期供给。

与调结构、补短板结合起来，实质上是让扩大政府投资“服从”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要求。一方面，不能因扩大社会总需求而重蹈“放水”覆辙，乱了经济结构调整的阵脚。另一方面，也不能因政策层面的相机抉择而忽略改革的推进，导致既定改革部署的搁置甚或回撤。

这又启示我们，应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固然要进一步加大政府投资规模、加快政府投资进度，但不可偏离与调结构、补短板相结合这一高质量发展阶段扩大政府投资操作的基本行动路线。其中，补短板是个牛鼻子。扩大政府投资不仅要瞄准补短板，以补短板的操作兼容扩需求和调结构两大目标。而且在扩需求和调结构发生冲突时，还要通过加大补短板的力度，让扩需求“迁就”调结构，把补足受制于人的核心技术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短板作为扩大政府投资的主要聚焦点和落脚点。

大不同于以往的增列赤字

增列财政赤字，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曾被当作积极财政政策的基本标志。无论减税降费还是扩大政府支出，最终都要归宿于财政赤字的增列。然而，这一通行于高速增长阶段的惯例，随着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进程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对于增列财政赤字问题的考量，越来越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为约束条件。

以防风险为约束条件，增列赤字便不能仅仅涉及宏观经济政策需要一个因素，而须有所忌惮，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要求通盘考量。鉴于当下中国所面临的金融风险与以往不可同日而语，更鉴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打赢的“三大攻坚战”之一，不仅要为增列赤字设置天花板或警戒线，而且须不遗余力守住天花板或警戒线。

以防风险为约束条件，便不能不对赤字高度敬畏。鉴于财政赤字不超越GDP的3%这一源自欧盟且为国际上广为引用的风险控制指标，一定程度上已演化为国人心理防线。须守住这一财政赤字防线，以此构筑起稳定国人预期的牢固屏障。

以防风险为约束条件，增列赤字对于扩大社会总需求的作用，便须掌握在“适度”而非“全力”范围内。即便为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增列赤字，其在提高供给质量、优化供给结构中的角色，也须定位于“辅助”而非“主力”队员。

这启示我们，应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固然要进一步增加财政赤字规模、进一步提升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但不可脱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底线。任何时候都不可放松对金融风险的警惕。既不能只管扩张、不计代价，又不能只管花钱、不管还钱。

全面理解积极财政政策

将积极财政政策与高质量发展阶段相对接，并分别对减税降费、扩大支出和增列赤字三项操作作具体分析的结果表明，套用以往的理解和认识来阐释和解读当下中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已经变得不合时宜。

不久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赋予积极财政政策的任务是“要在扩大内需和结构调整上发挥更大作用”，至少说明积极财政政策不止扩大需求一个维度。脱出单一扩张的视野局限而放眼积极财政政策运行的全过程，可以说，在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中国，从扩大内需和结构调整两个维度理解和认识积极财政政策，对积极财政政策作出全面和全新的阐释和解读，绕不开、躲不过，势在必行。

进一步说，鉴于积极不再等于扩张，以减税降费、扩大支出、增列赤字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实践也不再是财政扩张的同义语，按照“积极”的本来意义重新定义积极财政政策，让积极财政政策以“积极的立场”“积极的姿态”“积极的作为”介入和从事包括扩大内需、结构调整在内的多维度、多领域的宏观调控操作，可能是与时俱进地理解和认识积极财政政策内涵、阐释和解读积极财政政策行动路线的适当选择。

这样做，绝非可有可无之举。它不仅有助于让积极财政政策实践主动“对表”高质量发展要求，防止“新瓶装旧酒”，而且有助于对症下药，精准施策，以务实管用的举措应对中美经贸摩擦所带来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可以认为，这是我们保持战略定力和自信，走出一条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新路子的基础所在。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